

相互熟悉的過程中，氣氛熱烈。  
自左至右：吳嵐(威爾遜中心)、  
孫艷君(天津人民廣播電台)、Roger  
Chan (香港大學)、方晶(自然之友)、  
賴偉傑(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梁從誠(自然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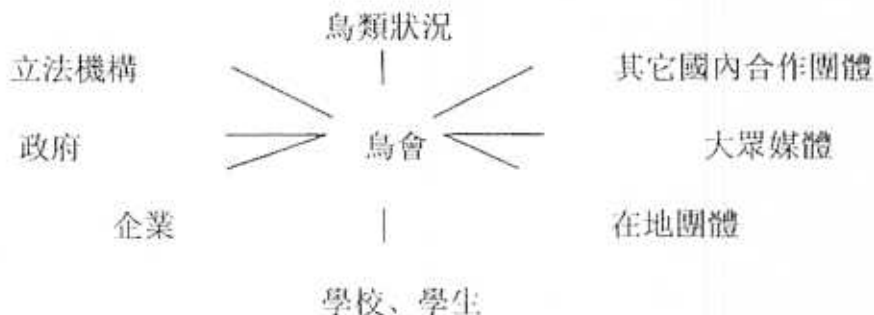


IBA模式，他向其它的NGO介紹了鳥會自身能力建設方面的經驗。(參見圖2)

在界定野鳥棲息地的整個過程中，鳥會跟不同的群體打交道，應該瞭解他們不同的需要，同時也要瞭解自身對於不同的群體的要求；在此基礎上，鳥會要根據自身的能力和特長來為這些群體提供服務，滿足他們的需要。比如，鳥會需要政府做的是政策上的支持和推動，經費上的資助，出版上的重視；政府需要的是好的吸引人的活動主題，能夠幫助樹立政府的形象，和擴大自己在國內國際民眾中的影響；而鳥會可以提供的正是自身在地的、國際上的合作網絡和伙伴關係，鳥會在地方上已經召集到1000名志願者。同樣的，對於企業，鳥會需要的是物質方面的捐助，而企業需要的是信譽、環保的形象。對於在校學生，鳥會需要的是志願者，學生需要的是經受培訓、獲得新知。對於當地社會，鳥會希望有更多的人參與，民眾希望有機會共同為一件事情出力。對於媒體，鳥會需要的是認知、並幫助宣傳，而媒體需要的是信息、知識。(編者按：這樣的一一對應的關係中，並不是簡單的“互利互惠”，而是NGO主動的去體察，去發現政府、企業、媒體和普通民眾都真正期盼什麼，然後從NGO自身來看，捫心自問，是不是能夠解決這些期盼。NGO要擴展自身的能力，不是漫無邊際的，而是基於社會中存在的不同類型的需要。)在這樣的相互支持的基礎上，鳥會才得以完成同29個團體在IBA項目中的成功合作。

聯絡：110台北市永吉路30巷119弄34號1樓，電話 886-2-87874551，傳真 886-2-87874547，  
電子郵件 csv@ms4.url.com.tw，網站 <http://bird.org.tw>

圖2、台灣野鳥學會IBA模式



## 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環保新聞發展

## 媒體

中國的綠色聲音：和諧與不和諧  
周乃菱，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座落在香港新界山間的賽馬會雙魚河鄉村會所，離中國大陸深圳市僅一步之遙。四月的季節，陽光照亮春花蓓蕾上點點的露珠。方三文剛剛結束了一個月的追蹤採訪，從內蒙到北京，沿著沙塵暴路徑一路3000公里下來。他在廣州的《南方週末》上大幅報道了沙塵暴侵襲後的村莊，缺水、缺糧，極度艱難的狀況。再看眼前，這一片鬱郁蔥蔥、蒼翠欲滴的景象，簡直是恍如隔世。來自大陸、香港和台灣的20多位環保新聞記者就是這樣開始了為期兩天的研討會。

剛過去的十年中，環保新聞在中國大陸有長足的發展，大量的記者發表和製作了數以千計的新聞和紀錄片，從水資源匱乏到瀕危生物，主題涉及廣泛。在香港和台灣，環保新聞已經走過了一條很長的路。環保記者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密切，協助提高環保意識，並對政府施壓，促進了影響政策的動員。

當這20多位來自兩岸三地的記者朋友坐在一起的時候，他們認同一種職業精神來報道環境的惡化和推進大眾對瀕危生態資源的意識的覺醒。然而，不同的政治構架、經濟發展階段和編輯重點都導致他們工作之間的差異。

#### 中國大陸：環保宣傳

大陸大批環境新聞的湧現並不是媒體自我意識的結果。在中國政府簽署了“21世紀議程”和聯合國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議通過的環發宣言以後，中國人大開展和推動了大量提高大眾環境意識的宣傳。人大環境與自然資源委員會制定了組織和實行環境報道的具體方案。此後的每一年，類似的方案規定了新聞報道的計劃、主題、對主要事件報道的時間表。所以，從這方面看，人大發起了一場自上而下的環境意識的推進運動。政治上的支持給了新聞記者一定程度上的採訪自由。據清華大學國際傳媒研究所的項目分析，八年來，大約有13000名各方面的記者寫了104000篇有關環境的報道。環保記者們在本次會議上談到，比起其它領域的記者，他們享受了更多的自由度。由於中央政府的支持，在有些採訪中，他們可以得到地方上的合作來調查採訪。

中國政府經過相當的一段時間認可了環境憂患的正當性。《中國綠色時報》（大陸第二有影響力的環境專業報刊，發行量在10萬以上）的編輯胡勘平回憶1985年創刊的時候，這張報紙的主旨是“清潔環境和思想上的污染”。當時，政府官員對保護環境的意義和需要的瞭解都相當模糊。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深化，許多官員出訪工業化發達國家，發現這些國家都公開承認環境問題的存在。事實上，經濟越發達，公民環境意識越強烈，並不以直面環境問題為恥。

在環境報道日益增多之後，環境課題也成為了一個人們熱衷的話題之一，吸引了更多有才華有想法的年輕記者加入報道的行列。孫艷君，天津人民廣播電台的記者兼編輯，製作了象“環境監護人”、“走遍地球村”、“綠色警鈴”和“綠色威脅遊戲”等想象空間很大的節目，使得原本可能比較嚴肅的廣播節目增添了情趣，提醒人們如何欣賞大自然和對環境破壞有所警覺。

方三文認為，象《南方週末》這樣在全國有20萬以上讀者的暢銷報刊，最適合長篇的具體的環境問題的調查。在編輯的支持下，他和同事及一名攝影記者，駕一輛吉普，從內蒙阿拉山盟沿沙塵暴的線路採訪，一直到北京郊區的山區。“我們儘可能寫一些經常引用的數據背後的故事：沙塵暴的次數從50年代的5次到90年代的23次。僅2000年一年，就有12次。而今年前3個月已經發生了6次。”方三文還提到：“在環境退化和經濟損失背後，還有大量的社會問題：食用

肉類、羊毛和皮草的質量下降會迫使牧民和獵民放棄傳統的生活方式，遷移到城市。由環境導致的對他們文化上的影響難以想象。”三位記者的採訪結果以日記的形式發表，並配以簡約的科學依據和政策爭議。

張可佳，《中國青年報》每周三“綠版”的主編，以論壇的形式給大眾一個討論環境問題的空間。她和志同道合的編輯記者還建立了“綠網”網頁，擴大讀者的參與。

汪永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資深節目主持人。她認為，記者由於感到自己有改變中國環境現狀的使命感而激情有加。環保記者並不僅僅是大眾瞭解環境問題的媒體，而且他們可以採取行動，改變已經作出的錯誤決定。“在缺乏以法加強環保的情況下，我們記者變成了環境的監護人。”在報道人口增長和工業化對長江生態的壓力的時候，汪永晨寫了有關游船傾倒塑料食品容器，污染了5500公裡的水域的情況。幾天之內，當地官員在民眾的呼聲面前立即採取行動，制止了傾倒，減緩了對河道的污染。

類似的政府對記者報道作出迅速反應的例子還發生在保護瀕危野生動物的問題上。電視新聞對金絲猴和藏羚羊生存受威脅的報道最後導致了政府干預，對它們的棲息地進行全面保護。這些是典型的成功的例子，甚至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但是它們只佔中國大陸環境問題中的很小比例。更多的報道集中在水質處理和林業上，對政府和企業的大規模投入清潔環境的宣傳讚揚超過了批評指正。

大陸的記者還需要迴避政治上敏感的問題，比如三峽工程就是一個禁區。“大事上，我們支持政府；小事上，我們提出相應的批評。”一位大陸的記者在會議中談到。在本次研討會期間，有一個大陸NGO代表在講演中，展示了一張在西藏，某木材公司用卡車裝載著一段名貴木材來招商的照片。儘管中央政府已經通過了禁止濫砍濫伐的條令，我們會議在場的大陸記者紛紛表示，他們不會輕易寫有關上面事件的報道，因為這件事情發生在西藏自治區，而禁止砍伐的法規在西藏執行得最不徹底。編輯不可能支持他們的記者來直接披露自治區政府，而要得到當地西藏自治區政府的合作進行事情的調查也有困難。

#### 台灣：雷池無界，熱點不熱

台灣的記者以參與台灣的環境意識普及和環境運動發展而感到自豪。政治壓力只會使他們更具備戰鬥力。與當地的環保NGO并肩作戰，他們動員公眾支持來對政府執行保護瀕危動物、禁止濫伐的有關法律和維護環境正義施壓。所以，當他們在會議中瞭解到大陸媒體受到的政治壓力和監察，有點不能理解。

林如森，《聯合日報》的資深記者，向與會記者展示了10年來他對環境問題的報道，以反應台灣環境新聞所涉及的領域。他對走私犀牛角-中醫使用的一種藥材-進行了兩年的跟蹤報道，並對引自各個國家的數據做了檔案記錄。他還對台灣人將走私進入市場的寵物猴放生歸還東南亞熱帶叢林進行了報道。

邱育慈，英文雜誌《台灣時代》的記者，談到台灣的環境記者在選題上有完全的自由：“沒有禁區，沒有所謂政治上敏感的話題。”她本人已經寫了很多有關生態保育的文章，從黑面琵鷺，到福爾摩沙的石林獼猴（台灣獼猴），到保護中部台灣的池南山脈柏樹林。

台灣記者的發言中講到，在民進黨還是反對黨的時代，他們是環保運動的主流，而政府常常被描寫成環保方面的“壞蛋”。現在，民進黨執政，環保運動已經不再是明顯的正邪勢力的較量。去年總統大選期間，有關建立核四廠的政策辯論相當激烈，這也是陳水扁最後當選的原因之一。但是目前，情況有所轉變，對國民黨腐敗的報道蓋過了環境問題的新聞。

#### 香港：環境問題是有關當地公共健康和生活方式的問題

許多年以來，空氣污染是香港環境記者最注意的選題。大廈林立的市區吸納著車輛排出的廢氣，存在有害健康的隱患。就在記者們發現已經很難通過對環境問題的記敘性報道來吸引讀者的

興趣的時候，去年發生的一起事件重新振奮了環境記者的熱情。

2000年10月，香港環境組織聯盟成功地上諫了一項投資70億港幣(合9億美金)的鐵路開發計劃，該計劃將穿越新界稀有鳥類棲息的一塊濕地。對於保護濕地否定開發計劃的政策爭論、活躍的反鐵路示威、以及最後開發計劃的擱置給環境記者們創造了集中報道、頭版發表的良機。

香港的環境記者還對在大嶼山建設一個垃圾處理場和迪斯尼樂園計劃的爭論進行了披露，這兩個計劃都對大陸架環境有負面的影響。《明報》的黃綺湘談到，在濕地問題上的勝利之後，立法委員們更加注意了自己公眾形象，對環境問題更敏感。隨著香港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他們也要儘可能避免被他們的選民視為反對發展的代表。

黃綺湘還談到，在報道基因處理食品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的過程中，環境記者自身受到的挑戰是，如何先完善自己在這個問題上認知，然後向大眾報道出一個比較平衡合理的情況。她同時提出在香港，環境報道總是被擠在社區板塊，雖登大雅之堂，要說服編輯內蒙的沙塵暴對港島也有直接的影響非常困難，而與香港沒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就很難贏得編輯的垂青。

#### 記者需要些什麼：專業知識和索取信息

由於科學性的信息有不確定因素，很多都是假說，記者報道起來，要達成與讀者的完全溝通有難度。因而，與會的所有記者都認為他們需要更多的專業領域中的培訓，從而具備全球視野和專業知識基礎。同時，他們也認為跟資深的記者學習個人經歷、對文化哲學問題的深刻討論也是非常有助的。

老生常談的“發展同環境保護的競爭關係”，現在出現一個新的有爭議的問題：如何使用新技術解決舊技術製造的污染？環境記者需要重新思考傳統的兩分法的寫作評判方式來寫這個問題。同時存在的另一個棘手的問題是，如何看待新技術引入的新污染？大陸、香港和台灣，都有一些污染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比如在香港和台灣，信息技術引起的室內污染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因為兩地的新經濟很大程度上都依賴於信息產業的迅速發展，社會中有一種自然而然的對新型的污染進行曝光的抵觸情緒。而在大陸，很少有關於有毒廢物排放和處理的報道，因為類似報道可能會引起經濟發達和落後地區的緊張關係。所以，記者在報道的時候就需要特別注意平衡對環境污染的警覺和對普通大眾心態的理解。

俄勒岡健康科學院的醫學教授陳世松在研討會期間強調指出環境新聞報道要深入，不能停留在表面，光製造泡沫。記者要關心可能的解決方法和公民如何協助政府制定有效的法律來保護環境。陳教授還向與會的記者簡單介紹了當今環境健康領域中發人深思的問題。比如環境問題中的性別因素，指由於女性生理荷爾蒙週期的原因，她們對環境危害的抵抗力更弱。研究表明，女性癌症患者數字在上個十年中直線上升與環境破壞有直接關係。“我們是為了我們自己的生命來保護環境的。”

兩天的會議中，儘管不同的政治經濟體系塑造了他們不同的觀點，記者們都盡力彼此溝通。除了上面提到的對專業知識的孜慮，大家還都感到來自商業方面的壓力。在台灣和香港，媒體作為商業機構，非常清楚環境新聞很難與暴力和色情新聞報道競爭讀者和廣告商。而大陸記者則懷疑如果沒有了來自政府的援助，環境報刊是否可能生存下去。

三地的記者可以相互提攜的另一個領域是編輯和寫作的技巧，如何在報道的同時，平衡自己的立場和客觀的態度。“我們雖然都用中文，但是直到今天，我們彼此之間的交流遠遠少於我們各自與國際團體的交流。”一位記者的戲謔之語卻點出了本次會議的初衷和三地記者之間溝通的疏落及必要，開誠佈公的交談是三地新聞媒體交流的開端。



和而不同：中國大陸綠色媒體與環保NGO關係之我見  
胡勘平，《中國綠色時報》編輯

畢竟綠色媒體與環保NGO都姓綠。廣汎地集合各種社會力量，攜手應對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綠色媒體和環保NGO的這一共同訴求，是它們之間開展有效合作的基本前提。不過因為在社會生活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同時各自的運作機制、方式、渠道、對象等也都有著明顯的不同，在中國內地，綠色媒體與環保NGO之間的合作就往往是一種各自獨立而又相得益彰的協作，而非亦步亦趨或步調一致的統一行動。在我看來，它們的關係不像是“四小天鵝”的舞蹈，而更像是和而不同的絃樂四重奏。

綠色媒體與環保NGO之間的合作有時看起來是以直接利益為紐帶的。作為一個報人，多年來我一直在探索通過與環保NGO合作擴大報紙社會影響力的有效途徑，先後與包括國際組織在內的多個環保NGO開展了不同形式的合作，如與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IFAW)合作向北京市中小學生、地理教師/教研組贈閱綠色報紙，與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合作評選首屆中國十大綠色新聞，與日本奧依斯嘉(OISCA)合作栽植中日青少年綠色紀念林，與北京的自然之友(FON)共同發起以反對籠養野生鳥為主題的“還鳥于藍天”活動，與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合作舉辦全國中小學生走進動物家園“綠色採訪團”活動等等。通過這些活動，報紙有效地拓展了讀者分布區域，同時我們通過在活動中發現的問題確定並推出了一系列有著自身特色的報道選題，這些選題使報紙的社會聲譽明顯提高。而對與我們合作的環保NGO來說，這些活動的成功舉辦使他們的名字更加響亮，使其內部凝聚力和對外吸引力都有一定程度的加強和提高，而這對其自身的持續發展勢必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合作使綠色媒體與環保NGO借助對方的力量事半功倍地實現了各自的不同目標，但最重要的是，從社會效果來看，合作使綠色媒體與環保NGO殊途同歸地推動了公眾生態環境意識的提高。

不過，綠色媒體與環保NGO之間的合作更多的是結合各自資源特點，相互為對方提供信息、理念、輿論乃至人力上的支持。一方面，從中國內地的實際情況看，環保NGO既是民間環保運動的組織主體和核心參與力量，又是綠色思想和綠色價值觀的思索者和倡導者；既是環境動態的信息庫，也是綠色理念的思想庫，更是環保行動者的人才庫。因此，對綠色媒體來說，環保NGO必然成為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支持力量。除了經常得到環保NGO提供的有價值的新聞線索和有分量的理論稿件外，我們的編輯記者在提到所謂綠色意識、綠色政治、綠色文化、綠色生活、綠色消費、綠色產品、綠色標誌、綠色建築等一系列綠色詞彙和綠色概念時，也往往會征求環保NGO的指導性意見。另一方面，中國內地媒體（包括綠色媒體）往往是政府功能的延伸和補充，亦即通常所說的“耳目喉舌”，兼有政府行政權力色彩和輿論監督色彩，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與西方媒體很不相同。對環保NGO來說，綠色媒體可以成為它們通往政府和各個社會領域的橋樑，可以提高它們的聲望並為其開展活動帶來諸多便利。

一個有著鮮明“中國特色”的現象值得注意，就是中國內地有著許多“兩棲”環保人——他們既為綠色媒體工作，又是環保NGO的活躍成員。如我本人就既是一家綠色媒體的部門負責人，又是內地兩家環保NGO的會員。內地的環保NGO成員幾乎都是志願者，吸引媒體人參與環保NGO的不是個人利益而是公益心。因此，一個清醒的媒體人在參與環保NGO的活動時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獨立判斷力。在中國內地，對自己所在環保NGO提出尖銳批評的媒體人並不罕見。媒體人經常僅以普通會員的身份參與環保NGO的工作，如我就曾在自然之友以會員身份從事綠色圖書編撰工作等。

在今天的中國內地，綠色媒體相對於綜合性媒體，還顯得十分稚嫩；環保NGO相對於其他社會組織，也遠遠談不上成熟。它們相互支撐著，艱難而又頑強地生長著。它們的腳下是各自的土地，它們的頭頂是共同的陽光。

## 面對一個轉了一半的社會

廖云章，台灣立報記者

目前在台灣新聞報刊界，政令宣傳的傳聲筒模式已經受到有線電視和信息技術的嚴重挑戰，政治民主化以後，新聞界呈現出百家爭鳴的景象。媒體數量的成倍增加和形式的不斷更新，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新聞取向的多元化趨勢，面對同一主題，多元化的報導體現出不同的解讀。

也許是媒體為了表現關心弱勢團體所作的平衡報導，與環境相關的新聞現在大幅出現。87年解戒之前，反核運動、公害抗議和工業污染的事件受到政黨刻意打壓，不見天日多時，現在開始受到媒體的垂青。隨著政治氣氛日益寬鬆，不少媒體一反過去隱晦曖昧的態度，給予反核人士、污染受害者發言的空間。

然而這樣的空間不是沒有缺陷的。現今的問題更多不是政治限制，而是媒體產業自身受到的經濟利益的驅動。在形式化的平衡報導下，長期被漠視的環保團體的意見，可以有發聲的機會，但渠道並不暢通。只有符合報社立場、和當下政治的主導傾向的，才能得到全面的伸張。環保團體的主體性和實際立場，難以透過媒體的報導完整呈現。不僅是媒體運作過程影響了精確論述環境問題，更重要的是，環保團體的訴求常常和媒體的利益衝突。而媒體的利益就是媒體背後的財團利益。台灣社會的發展目前還沒有達到摒棄所有社會經濟弊端的程度，財團掌控媒體的現象雖然不至於明目張膽，但也確實存在。

脫離專權控制的台灣媒體，正面臨著自由市場的誘惑和挑戰。民主化以後，新聞記者在不同意識形態下工作，如何把握對環境新聞的準確詮釋是一個挑戰。背負新聞道德的十字架，站在潔淨與污染的臨界點，媒體記者面臨的是一個轉了一半的社會。



世界自然基金會中國項目的丁鵠正在努力說服新聞記者一則環保新聞的價值。

# 組織

## 插頁1. 黑頸鶴保護協會

成立時間: 1998年12月

成立地點: 雲南昭通

發起人: 孫德輝

成員: 全國範圍208人

經費: 會費 30元/人, 學生15元/人, 農民免會費

### 主要活動

- 1) 三個越冬期為黑頸鶴人工投食, 總數三萬斤糧食;
- 2) 配發五個望遠鏡給農村投食員, 用於及時發現傷病鶴, 進行救治;
- 3) 自制展板到農戶及學校進行愛鶴意識教育;
- 4) 出版《黑頸鶴》會刊八期;
- 5) 觀察和統計黑頸鶴每年的數量, 遷飛時間和食物變化等越冬生態。

### 計劃活動

- 1) 籌集資金購買黑頸鶴越冬糧食, 進行人工投食;
- 2) 調查雲南、貴州、四川三省黑頸鶴的分佈及濕地狀況, 讓新越冬地的黑頸鶴也得到保護;
- 3) 幫助大山包的農戶解決燃料問題, 避免農戶再到沼澤地挖草煤, 恢復沼澤濕地的自然生態;
- 4) 籌集資金購買救治黑頸鶴的醫療藥品和器械;
- 5) 在大山包建立保護站;
- 6) 對滇東北的十個黑頸鶴分布點的村民進行一次愛鶴電視教育。

孫德輝, 一個真正的自然主義者, 八年來自費致察拍攝世界上最珍貴的鶴類—黑頸鶴, 足跡遍及雲南及周邊省份。先後在《中國攝影》等發表黑頸鶴專題文章十余篇, 拍攝黑頸鶴生態照片9000多張。成立黑頸鶴保護協會以後, 他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積蓄, 支持和教育當地的農民來實現為4000只黑頸鶴創造安寧家園的想法。我們的會議期間, 孫德輝生動渾厚的對大山包地區生態破壞狀況的講述, 使在場的環保人士無不為之觸動。

聯絡: 雲南昭通, 文昌路89號, 657000。

電話86-13708602145

## 插頁2. 綠色之友

成立時間: 2001年2月

組織地點: 天津, 以天津市環境科學會綠色教育工作委員會的名稱在天津市民政局註冊

發起人: 朱坦教授, 南開大學環境工程學院院長

會員: 個人會員100以上, 團體會員10個以上

經費來源: 會費10元/人, 組織負責人個人捐款

### 主要活動

- 1) 宣傳環保知識;
- 2) 不定期地就公眾關心的環保問題或突發性環境事件進行調研, 并向有關部門提出合理化建

議；

3) 開展環境保護方面的國內外民間合作。

#### 目標活動

- 1) 培訓綠色教育老師；
- 2) 向環保企業、投資者提供諮詢服務；
- 3) 辦一份會刊；
- 4) 環境教育基地建設。

綠色之友是目前為止天津市第一家民間自發組成的環保社會團體。協會的秘書長，孫艷君女士本人是天津人民廣播電台的記者。在會議間隙的交流中，她談到北京地球村的成功對他們協會成立的影響。孫艷君在電台每周有一檔環保節目。在一期節目中，孫艷君介紹了北京地球村，聽眾就有打電話要參加的。但是中國的NGO法律上不能成立地區分部，所以她無法成立一個“地球村天津分會”。但這後，除了做節目之外，孫艷君也組織聽眾開展一些公益活動，時間長了，積極分子們也希望有自己的NGO。在與多位人大代表的商議之後，綠色之友就開始醞釀成形了。

聯絡：天津和平區衛津路143號，300070。 電話-86-022-23401194

### 插頁3. 貴州地球之友

成立時間：1997年

組織地點：貴州貴陽，以 *地球之友貴州環境生態教育基地* 名稱在貴州省教委註冊登記

發起人：楊炯鑫教授和肖進原教授

會員：6000人以上(主要在貴州)

資金：自籌研究經費

#### 主要活動

- 1) 面向大、中、小學生開展系列生態環境講座；
- 2) 編印環境教育教材；
- 3) 建立草海環境生態教育基地；
- 4) 在自然保護區開展學生夏令營。

#### 目標活動

- 1) 組織學生觀鳥活動；
- 2) 與政府、企業共同合作管理草海環境生態教育基地；
- 3) 爭取更多志願講師，擴展結合政府官員、學校教師、學生家長和學生的網絡。

身為環境科學家和鳥類學家的楊炯鑫教授，長期從事于政策和研究工作。1995年，他應香港大學教授、香港長春社主要負責人吳祖南博士的邀請到香港參加東南亞環境教育會議，非常震驚于東南亞綠色NGO的蓬勃發展和積極作用。楊教授當時就有了開展實際的民間環保活動的想法。兩年後，楊教授退休，時年55歲，拿出自己一生的積蓄，建立了貴州地球之友。(編者按：貴州地球之友與國際NGO“地球之友”沒有直接關係，不是後者在貴州的分會。)目前為止，組織的主要經費還是靠楊教授和他的同事們從自己的研究經費里省出來。在這種經費有限的條件下，他們得到了教師、研究工作者和學生家長的志願支持，從而連續地開展了環境教育的講座。為了保證持續的經費來源，2001年開始，楊教授他們開始一項大膽的嘗試：貴州地球之友成為草海生態教育基地的控股單位之一。草海生態教育基地將來要發展成為一個專門用於環境教育活動和野營的基地，貴州地球之友從它的運作收益中的獲得也將會為組織發展經濟上的保障。這樣一個政府—企業—NGO聯合的模式，很有希望同時解決貴州地球之友自我生存和草海基地管理的問題。除此之外，貴州地球之友還與香港長春社有長期的鳥類觀賞方面的合作。



聯絡：貴州貴陽，寶山北路160號，貴州師範大學，地理辦公室，地球之友，550001。  
電話 86-0851-6702087 電子郵件 zlbmu@sina.com

#### 插頁4. 四川大學環保志願者協會

成立時間：1995年

組織地點：四川成都，四川大學

發起人：盧紅雁

會員：幾百名學生會員

資金來源：中國地方企業、學校和政府環保機關捐助，國際環保NGO的項目資金

##### 主要活動

- 1) 校內校外的環境教育，包括講座、辯論、展覽、電影節、植樹活動、社區調查、田野調查，以及同當地小學開展活動；
- 2) 改革和加強四川大學環境課程。目前開設的課程有，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本科生必修課)，MBA專業環境課、環境教學項目(環境專業研究生必修課)；
- 3) 將建立中國大學第一個環境教育中心，目標在於：A、協調和系統化上述的活動；B、協助中國學生環保組織聯合網 ([www.greensos.org](http://www.greensos.org))；C、應用信息技術開發教學方法；D、加強學校、政府機關、國內國外有關民間組織以及各類社區組織的交往和合作；E、尋找國際合作機會，發展跨國界的交流、研究和實際項目，將更多的年輕人融入進來。

聯絡：四川成都，四川大學環境學系，610065。 電話 86-28-5408285

電子郵件 luhy@greensos.org 網站 [www.greensos.org](http://www.greensos.org)

#### 插頁5. 綠色高原

成立時間：2000年3月

組織地點：雲南省迪慶州中甸，在北京市西城區工商局註冊

發起人：史立紅、奚志農

成員：3名常規工作人員

經費：環保基金會的贊助和個人捐款

##### 主要活動

滇西北地區的自然保護與環境教育：

- 1) 環境教育：A)迪慶州環境教育教師培訓；B)迪慶州小學生“愛我迪慶、保護環境”作文繪畫比賽；
- 2) 自然保護與社區發展：A)那仁村村民巡山項目；B)那仁村傳統民居改造項目；C)那仁村婦女織毯項目。

綠色高原的創始人是一對環保夫婦，兩人在大陸的環保界都有突出的作為。奚志農就是那位在1996年為雲南的金絲猴奔走呼救的攝影師；而史立紅，有多年在環保新聞機構和國際環保組織工作的經驗，90年代中期以後，一直活躍在自然之友、藏羚羊網等多類民間環境保護活動中。現在，綠色高原還在襁褓階段，但已經得到國內國外環保NGO的關注，因為它是比較少的從大城市返回、并扎根于邊遠山區的草根NGO。跟其它新興的NGO一樣，史立紅出差到國外、或者通過遠程教育的方式進修NGO管理課程，希望把這個小小的組織也能辦得有條理，專業化。

聯絡：雲南迪慶州中甸郵政22號信箱，674400。 電話/傳真86-887-822-9681

電子郵件 zhinong@pubic.km.yn.cn

## 插頁6. 藏羚羊信息中心(TAIC)

**成立時間:** 1998年

**組織地點:** 北京, 一個由志願者組成的以互聯網為媒介進行的野生動物保護項目

**發起人:** 史立紅, 胡佳(現任藏羚羊信息中心負責人)等二十多位志願者

**會員:** 核心人員7人, 沒有固定會員

**資金來源:** 世界自然基金會-中國項目(WWF), 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中國代辦處(IFAW); 自然之友提供很多資料和圖片支持; 本年度的資金是1000美元, 由美國全球綠色資助基金(GGF)提供。

### 主要活動

- 1) 成為藏羚羊及保護權威信息中心, 進行資料收集, 交流最新消息、中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的發展、學術信息和國際瀕危動物保護動態等;
- 2) 以網絡為媒體, 策劃各種活動, 從資金、人員、社會輿論等各方面給予藏羚羊保護以支持;
- 3) 在完成藏羚羊網站的建設工作, 進入維護期後, 逐步建設瀕危物種信息中心, 資料庫及保護同盟, 充分運用網絡的力量, 聯係各個方面的人士。

從80年代中後期開始, 大量非法淘金者紛紛湧入可可西里, 羌塘, 阿爾金山等“無人區”(西藏和川西地帶)從事非法采金活動, 最多時達十萬餘人。由於食物嚴重短缺并缺乏管理, 非法淘金者開始獵殺野生動物以補充食物的嚴重短缺。隨著淘金者人數的增多, 一部分人開始專事獵殺藏羚羊, 并逐步形成了夏季淘金, 冬春打獵的格局。到了95年, 當地的政府和民眾中已經自發地組成“野犛牛隊”, 制止盜獵者的肆虐。“野犛牛隊”隊員不斷犧牲, 激起了北京及全國支持他們事業的環保人士的憤怒, 一張保護藏羚羊的“網”就這樣展開了。如今, “藏羚羊網”是一道沒有硝煙的戰線, 時刻關注著可可西里盜獵與反盜的情況。所有有關的國家法律文件已經上網, 國內國際動物保護組織和個人都通過這張“網”及時溝通信息。負責人胡佳不僅是“藏羚羊網”的中樞, 而且幾乎成為中國環保民間活動的一個信息發佈站。藏羚羊網因為是志願者建立的網站, 核心的成員有徐健、吳永、楊洋、黃景文、閻保華、馬昭, 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繁重的本職工作或學業, 所以整體的工作流動性較大, 長期有效的發展需要新的構思。

**聯絡:** 北京市朝陽區十里堡北里4號樓421, 100025。 電話 86-10-85835522  
電子郵件 [hujia@taic.org](mailto:hujia@taic.org) 或 [hujia@public.bta.net.cn](mailto:hujia@public.bta.net.cn) 網站 [www.taic.org](http://www.taic.org)

## 插頁7. 綠色江河

**成立時間:** 1994年底開始籌備, 1999年正式註冊

**組織地點:** 以四川省綠色江河環境保護促進會的名稱在四川省民政廳註冊。1994年底在長江源的三條源流和通天河流域建立四個自然生態保護站, 1996年5月開始在長江北源可可西里東側建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 1997起運行。

**發起人:** 楊訢

**成員:** 綠色江河採用輪換志願者的形式, 志願者來自當地社區和全國各地的大學, 人數保持10至20人。

**資金來源:** 國際環保NGO和基金會捐助(如: 香港地球之友、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 企業、個人捐款, 及楊訢本人義賣自己的《長江魂》《長江源》兩本書所得。

### 主要活動

“保護長江源, 愛我大自然”

- 1) 建立保護基地, 與當地科研機構、記者合作, 對長江源這一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進行考察研究, 收集基本數據, 制定更加切實有效的保護計劃;
- 2) 以保護站為基地, 協助當地政府開展反盜獵巡邏檢查;
- 3) 招募志願者, 向當地農民、過往遊客進行環保宣傳教育。

### 目標活動

- 1) 完成索南達傑保護站的建設，科學設備的購置和社會設施的改善，使該站能最充分的運作起來；
- 2) 長江上游地區生態環境現狀定期考察，對破壞草場、砍伐原始天然林的行為進行監督，並將每年的考察和監督結果公佈，促進長江上游地區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發展；
- 3) 通過電視紀錄片、圖書等形式更廣泛的呼籲社會各界關注和支持長江源頭的生態保護。繼《金沙江》(1997)、《長江源》(2000)之後出版《長江源的生物多樣性及其保護》第三套書；
- 4) 在金沙江流域建立一個民間環境教育中心；
- 5) “熊貓車”流動教學計劃，每年將進入50所學校開展環境教育。

楊訢是一個真正熱愛長江的探險家。他曾五次涉足長江源探險、漂流、考察和攝影，親眼目睹了長江源區自然生態環境迅速惡化的過程。94年以後，楊訢需要為綠色江河四方奔走籌款，以及開展社會宣傳活動，但他仍然花大半年的時間在自然條件極其艱苦的自然保護站上。跟在城市開展工作的環保NGO有所不同，綠色江河的工作者們不僅要跟當地民眾喫住在一起，而且更是真正扎在自然環境之中的。綠色江河將探險家、科學家、反盜獵隊員、記者和志願者集合在中國西部一起保護長江源。

聯絡：四川成都建設南新路27號，610051。 電話86-28-4328252  
電子郵件greenriver@mail.sc.cninfo.net 網站 <http://green-river.org>

### 插頁8. 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

成立時間：1996年3月

組織地點：北京，註冊于北京市朝陽區工商管理局

發起人：廖曉義

會員人數：11名全職工作人員，沒有會員，以“熱心人”形式擴展自身的組織影響

資金來源：社會捐贈，項目實施合作經費

### 主要活動

- 1) 可持續消費的理念推廣與實踐。地球村以不同形式集思廣益，推廣可持續理念，促成民間組織、科學家、市民的交流。自1996年4月22日至2001年3月，地球村在CCTV-7獨立籌辦並製作每周一期的電視專欄《環保時刻》，製作和播出節目近300期。2000年，地球村策劃並組織了由六家民間組織共同發起、十幾個地方民間組織參與的“地球日中國行動”。他們還通過多種深入淺出的讀物、光盤、掛圖、講演等形式，將理論和經驗傳播到學校、社區、企業和有關政府部門，為環保教育提供了通俗教材和參攷指南；
- 2) 綠色社區的建設與發展。1996年12月，地球村幫助建立了北京首家垃圾分類試點；並與宣武區政府合作，于1999年4月在建功南里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綠色社區試點。綠色社區模式包括：綠色建築、節能、節水、垃圾分類和綠化的環保設施；一個有各界代表參加的聯席會議和一支能起骨幹先驅作用的志願者隊伍；一系列持續性的環保活動和一定比例的綠色家庭；
- 3) 生態修復與保護。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培訓基地位於距北京70公裡的延慶縣井莊鎮確白石村，有山地、林地、濕地、荒野及山泉小溪在內共2800畝。該基地集生態保護、環境教育、培訓、諮詢和交流為一體；
- 4) 綠色奧運主題。地球村負責人被北京奧申委聘為環保顧問，在“綠色奧運行動計劃”的制定以及民間組織聯席會的建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地球村與北京市少工委合作，向北京市83萬小學生發放了綠天使承諾卡，通過孩子把綠色奧運的理念帶進他們的家庭。與中國消費者協會共同策劃了“千萬個綠色消費志願者在行動”的綠色消費調查承諾活動，全國廣大消費者由此接受了綠色奧運、綠色消費的信息；

5) 國際交流合作。自成立以來，地球村接待了不少關心中國環境的外國學者和NGO同行，也會見了不少外國政府高級官員，如1998年7月，地球村作為7位代表之一被邀請參加了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期間在桂林召開的環保圓桌會議，也接受了美國的CNN、新聞週刊、英國路透社、日本、挪威、加拿大、澳大利亞、瑞士等國的重要媒體的採訪，發揮自己作為民間組織在國際社會中的獨特的影響，向世界傳遞中國的綠色信息。

地球村的發起人廖曉義女士90年代初開始留學美國，在那段時期瞭解了美國及世界環境運動的發展情況，決定成立NGO來改善中國民眾環境意識淡薄、大眾參與環保程度低的現狀。從96年成立，地球村的成員擴展到了11名，影響面涉及普通大眾、新聞媒體、政府官員和國際環境與發展機構。廖也成為2000年歐洲環保突出貢獻“蘇菲獎”的榮譽獲得者。地球村的成功，對中國環境NGO的全面展開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目前他們還是一家註冊的“私營企業”，這種生存發展模式引起有關學者和關心中國環境的人士的深入思考。

聯繫方式：北京市朝陽區北苑路86號，100101。電話86-10-64891037 / 64891038  
傳真86-10-64946235 電子郵件 gvb@public3.bta.net.cn 網站 www.gvb.org.cn



鐘明光(美濃愛鄉協進會)和宋慶華(北京地球村)交流NGO工作的甘苦。

#### 插頁9.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成立時間：1989年

組織地點：台北總部、台中工作室

發起人：多名家庭主婦

會員：5000名左右會員，100名左右志願者和7名全職工作人員

經費：會費，年度會員600元，榮譽會員10000元，接受捐款及專案認捐

#### 主要活動

- 1) 監督政府落實“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垃圾減量”政策的執行；
- 2) 舉辦“環保媽媽營”及“生活環保動手做”課程，鼓勵更多主婦加入生活環保的行列；
- 3) 透過電台、報紙等媒體或社區、學校、公私機構，宣傳綠色消費、辦公室環保、生活環保、簡樸生活等理念和做法；
- 4) 推動使用再生紙，自備環保隨餐包、購物袋；
- 5) 推動家庭有害廢棄物回收處理，共建無毒的家；
- 6) 推動廚余落葉做堆肥；



- 7) 推動回收廢油做肥皂；
- 8) 調查環境現狀，如環境衛生評估、全台灣環境社區致核；
- 9) 結合環保社團關心環境議題，共組反核行動聯盟、生態保育聯盟、等跨團體組織。

作為台灣歷史最長的非盈利環保組織之一，主婦聯盟聯合婦女共同維護環境和推進環境教育。80年代中期，和台灣其它綠色組織一樣，主婦聯盟參與到馬路示威和遊行。最早的一次遊行中，主婦們將垃圾傾倒在一位立法會委員的辦公室，以反對台灣不實行垃圾回收的政策。這樣的做法導致了不少主婦被捕，但是最後致使台灣政府開始執行回收項目。

聯絡：台灣，100台北市汀州路三段160巷4號5樓之1。 電話 886-2-23686211  
電子郵件 homemakr@ms15.hinet.net 網站 <http://forum.yam.org.tw/women>

#### 插頁10. 綠色陣線協會

成立世界：1997年6月

組織地點：台北，台灣

現任執行長：伏嘉捷

會員：15位(7位全職)工作人員，一部分志願者(大範圍發展會員並不是綠色陣線的主要精力所在)

資金：主要經費來自于政府贈款和項目競爭款

##### 主要活動

通過研究項目、示威、運動和與社區合作來實現自己草根的和伸張環境正義的目標：

- 1) 政策研究及批評。有害廢棄物處理、能源政策及電業法、垃圾費征收方式及資源回收體系、山坡地保育、農業及有機產品政策等；
- 2) 組織拓展。讀書討論會、會員聯誼活動、學生營隊；
- 3) 專案研究。台北市社區規劃、九二一地震災區草根組織發展、農業產銷調查、禽畜糞有機堆肥推廣調查、海岸問題及親水指數。

在常規的活動之外，綠色陣線還組織有針對性的對政府政策和有關官員的批評。比如一個有關循環利用政策的案例，他們起訴了台灣環保委員會。1998年，他們還成功遊說台北市政府開始實行“按袋收款”的政策，以教育大眾垃圾處理的實際費用。在台北，此政策致使垃圾再循環率從原來的2、3%提高到40%。98年，綠色陣線的政策建議工作已經突破了台灣的範疇，他們去到柬埔寨，收集材料證明，台灣廠商台塑公司已經造成了汞污染。這件事情以後，綠色陣線不僅在國際上引起注意，而且鼓勵了台灣本地組織爭取更好的工業政策。

聯絡：台灣，106台北市信義路3段147巷36弄22號。 電話 886-2-270-80961  
電子郵件 [gff@gff.org.tw](mailto:gff@gff.org.tw) 網站 [www.gff.org.tw](http://www.gff.org.tw)

#### 插頁11. 荒野保護協會

成立時間：1995年

組織地點：台北總會，在台灣有8個分會、6個聯絡處；在海外有馬來西亞、尼加拉瓜聯絡處

發起人：徐仁修博士，自然攝影家

成員：5000以上家庭會員

經費：會費(入會費1000元/人、年會費1000元/人、學生減半)、捐款、授課研討會所得

##### 主要活動

- 1) 每年在台灣組織500次以上演講和客座講演，150次以上自然體驗營和兒童營；
- 2) 出版荒野雜誌和荒野電子快報；

- 3) 在台灣不同城市主辦5個廣播節目；
- 4) 每年舉行20次培訓和研討活動(包括自然解說員、生態寫作、自然攝影)；
- 5) 會員成為台灣自然地塊的保護者，抵制台灣東海岸過度開發和私人能源工廠在自然土地開發，認養、圈養野地，並規劃為自然教室。保護在新竹的最後一塊台灣本土的食蟲植物的栖息地。

#### 目標活動

- 1) 建立兒童自然教育體系，包括編寫教材，培訓教師和年輕自然講解員，爭取一個自然教育設施；
- 2) 籌款爭取更多的荒野地，並且使得自然循環能夠進行，從而保護野生物種；
- 3) 開發項目來培訓自然主義者和自然保護人員；
- 4) 建立一個法律小組來監督政府環境立法和決策；
- 5) 監督國家公園的管理，出版國家公園白皮書；
- 6) 協助政府機關保護水土資源和其它自然資源；
- 7) 為提供提高自然保護意識提供更多生態教育的機會。

荒野協會的理念是“荒野是生命開始的地方”。荒野的創始人認為台灣已經被過度開發，在人們獲得表面物質生活繁榮的過程中，台灣島的自然環境已經遭到極度破壞，物種開始滅絕，自然災害也越加頻繁。荒野建立的初衷就是要為了台灣的將來保護最後的荒野之地，核心任務就是取得監護和管理自然荒地的權力，讓自然能夠自我更新。如此的土地保護計劃通過購買土地、長期租賃、信貸和捐助建立保護地而實現。荒野期望通過他們的工作為提高自然保護意識提供更多的生態教育機會，營造更好的氛圍。

聯絡：台灣台北總會，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一段113號1樓。電話886-2-2930-3193  
傳真 886-2-2934-6318，電子郵件 sowtw@ms10.hinet.net 網站 www.sow.org.tw

#### 插頁12. 高雄市教師生態教育中心

成立時間：1998年6月

組織地點：台灣高雄市

現任主任：李根正

會員：核心成員11-15人，由高雄市各級學校願意協助推動生態教育的老師及社會人士擔任聯絡人，聯絡人有近100人

#### 主要活動

- 1) 為台灣教育工程注入自然基因，如認識水資源、山林守望者、短期培訓等。兩、三年間，有3000多人參加活動，環境課題已經成為高雄市教育界關心的問題；
- 2) 守護森林，守護家園，參與搶救國家公園森林的工作；
- 3) 立足南方，綠色深耕。展開各種研究調查工作，出版季刊，研發教材，希望能夠建立教育基地。

李根正老師在研討會期間展示了生態教育中心開展的各類活動的照片，其中有一些是關於生態中心的老師向部分居民解釋保護森林的意義的。居民不願意離開世代相守的老土地，但是妨礙了森林保育工作，生態中心的老師們不被理解接受，反遭毆打。李老師和他的同事們並沒有因此而洩氣，動手的居民後來也有翻悔之意——看來做環保的NGO工作，也不是沒有風險的！

聯絡：台灣，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71巷5號2樓，801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標09號5樓。  
電話 886-2-33931061，886-7-2155660-18 傳真 886-2-33931065，886-7-2159951  
電子郵件 ntaeec@mail.nta.tp.edu.tw 網站 www.nta.tp.edu.tw



兩位台灣環保界老朋友，林聖崇(左，台灣生態聯盟)和李根政(高雄教師生態中心)談興正濃。

### 插頁13. 香港環保NGO索引

#### 1、長春社

香港第一個環保NGO，建立於1968年。(詳見李煜紹與吳祖南的文章)  
香港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130號嘉碧大廈5樓A室。[cahk@netvigator.com](mailto:cahk@netvigator.com) [www.conservancy.org.hk](http://www.conservancy.org.hk)

#### 2、地球之友(香港)

註冊慈善環保組織，1983成立，致力於通過教育、研究和遊說來保護和改善香港的環境。19位專職人員，超過1000會員，140以上學校及非政府組織會員。  
香港灣仔維多利亞道53-55號2樓。  
[foehk@foe.org.hk](mailto:foehk@foe.org.hk) [www.foe.org.hk](http://www.foe.org.hk)

#### 3、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全球WWF網絡的一個獨立的分支機構。香港的3個辦公地點有50以上專職人員，50人組成的9個自願委員會，提供相關領域的專業建議。14000名會員，包括成人、少年、教師和家庭會員。自1981年以來，他們在香港和中國大陸實施了多項生態保育和環境教育的項目。  
香港中環街1號。[wwf@wwf.org.hk](mailto:wwf@wwf.org.hk)  
[www.wwf.org.hk](http://www.wwf.org.hk)

#### 4、綠色和平—中國

他們保持綠色和平組織在全世界的一貫作風，以非暴力直接的方式在環境遭受破壞的地方採取行動。正在進行的項目包括建設一個無毒的珠江三角洲、改善東江水質、禁止基因改造食品以及廢物焚化。香港上環蘇杭街95號東利商業大廈一樓。  
[greenpeace.china@diaib.greenpeace.org](mailto:greenpeace.china@diaib.greenpeace.org)  
[www.greenpeace-china.org.hk](http://www.greenpeace-china.org.hk)

#### 5、綠色力量

一九八八年由一群香港市民自發創辦，最初竭力傳播綠色生活文化和提高公眾對當地環境問題的意識。最近幾年，加大力度發展生態保育工作，在1997年於屯門龍鼓灘開設了中華白海豚資源中心，讓市民認識中華白海豚及其所面對的威脅。此外，他們更拓展與中國環境保護部門的聯系及交流，與廣州環保局及廣州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所於龍歸鎮共同創辦了綠田野生態教育中心，為中港兩地進一步的環保工作及綠色文化交流奠下基礎。  
香港九龍佐敦道2號地下。  
[info@greenpower.org.hk](mailto:info@greenpower.org.hk) [www.greenpower.org.hk](http://www.greenpower.org.hk)

#### 6、綠田園基金

1988年成立，是全港第一個有機教育農場，由一群致力於推廣有機耕種、環保科技的熱衷者成立。並於新界粉嶺設立兩個總共佔地面積為360000平方英尺的農場，舉辦不同種類的教育活動，好讓香港市民進一步認識最新的綠色科技及綠色管理概念可以如何令人類活得更好，但同時與大自然合作，讓萬物生生不息。有關園藝、食品及綠色生活的書籍、季刊和手冊都有出版。粉嶺的有機農村還出售自種新鮮蔬菜。  
新界粉嶺鶴藪村18號。[Info@producegreen.org.hk](mailto:Info@producegreen.org.hk)  
[www.producegreen.org.hk](http://www.producegreen.org.hk)

#### 7、爭氣行動

致力於引入和實行根本上改善香港空氣質量的策略：1) 推廣和公開有效的、以社區為基礎的空氣污染控制方法；2) 與政府及有關方面合作確定實際的解決辦法；3) 開展有關健康和財富的環境問題的大

眾教育。  
香港筲箕灣亞公巖村道5號東都中心8字樓。  
[info@cleartheair.org.hk](mailto:info@cleartheair.org.hk) [www.cleartheair.org.hk](http://www.cleartheair.org.hk)

#### 8、思匯

一個獨立、非盈利的公眾政策研究機構，通過加強公民參與公共生活來推動公民教育，公眾意識和公眾參與政治管理；進行科研和經濟、社會和政治決策與實踐的發展。思匯通過一種“准真實”的方式工作，它的工作人員、研究員和助理人員都獨立工作，由現代化的通訊手段進行溝通。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2號長江中心16樓。  
[lisah@civic-exchange.org](mailto:lisah@civic-exchange.org)  
[www.civic-exchange.org](http://www.civic-exchange.org)

#### 9、坪洲綠衡者

成立於1991年，位於香港島西面大嶼山東面的一個面積約一平方公里之小島。(詳見陳烈芳的文章)  
香港坪洲南灣4號B，香港坪洲郵政信箱十八號。  
[gpengchaua@hkbn.net](mailto:gpengchaua@hkbn.net)  
[www.greenpengchau.org.hk](http://www.greenpengchau.org.hk)

#### 10、大澳文化工作室

依靠志願捐款于1982年成立于香港大澳島的工作室希望成為大澳島本地居民可以集結并參與研究文化活動的場所來維護本地的傳統。他們計劃在自己的社區中實行可持續性發展。這個草根組織還關心島上自然環境的保護和普及環境教育。他們的成員包括熱心環境的年輕人、教師、教授、職員、社工和學生，共同來保持和關注大澳的傳統、環境和未來的發展。  
香港大嶼山，大澳，G/F 54 永安街。  
電話 852-2985-6118。



新朋舊友俱開懷-環保大家庭會後合影



# 信任

跨地區民間交流和環境信任的建立

吳嵐、吳逢時

威爾遜中心

儘管經濟和文化的交往日趨緊密，相互間的不信任感仍然為當前的海峽兩岸關係蒙上一層陰影。<sup>1</sup> 對台灣地位問題的爭議和北京方面有時施加的壓力恰好支持了“衝突在兩岸關係中不可避免”的論調。可能存在的衝突因素提醒決策層更加重視大陸與台灣之間的對話交流和合作關係，而問題的難點在於決定哪些政策領域的合作會更容易對兩岸的溝通和互信起到催化作用。

過去的二十年中，兩岸關係中比較明朗的一面是日益頻繁的貿易往來，並且被廣泛視為增進了雙方的繁榮以及和平的氛圍。順著這樣的思路，提高對兩岸共同存在的環境問題和生態相互依存的意識，也可能創造新的互利和平的交往契機。

威爾遜中心環境變化和安全項目（ECSP）主辦的研討會和出版物的一個關注重點是評論和探討有關環境惡化引起國家、地區和民族之間的衝突這一學術理論的政策意義。<sup>2</sup> 1997年以來，除了環境-安全問題廣義上的研究，ECSP還發展了環境與中美關係工作組，期望在中美兩邊的決策者、NGO和學者之間就環境和能源方面問題建立對話渠道。民間環保組織和環保新聞論壇是我們工作組的一次嘗試，旨在為大中華地區的環保NGO和記者提供一個機會來交換信息和交流彼此在環境教育、政策建議和輿論監督方面的工作經驗。我們對本次論壇的希望是務實的，並沒直接提出海峽兩岸環境合作的提議，但是，研討會中所呈現出來的熱烈的交流場面重新引起我們對環境促和在台灣海峽以及世界其它區域的可能性的思索。

## “環境促和”的概念

儘管環境惡化與衝突之間的關聯已經得到了學術界足夠的重視，但是相關的反命題，環境合作是否能促進地區和平，尚未得以充分解釋和研究。這個命題的意義不僅在於環境合作可能避免生態問題引起的衝突，而且在於環境方面的合作有益於不同層面上的廣泛的合作以促進和平。<sup>3</sup>

Conca 和Dabelko 在論述環境促和問題中，認為有兩條渠道來實現環境合作進而促進和平：國家間的渠道和跨社會的民間渠道。<sup>4</sup> 在這兩個層面上，環境方面的合作可以扭轉國家、地區和民族之間的談判氛圍，建立彼此之間的信任和相互依存。比如說，環境問題通常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段來解決，所以針對環境問題的合作可以給予決策者時間上更大的余地。如果國家間建立起有效的長期戰略來解決環境問題，他們可能在更廣泛的領域內培養一種互利互惠的交往常規，並減低不確定因素的干擾。非政府組織(NGO)層面的環境合作可以建立跨社會民間交往的機制，並且圍繞生態問題樹立共同的行為準則和認識。

## 台灣海峽背景下的環境促和

如前面所提到，幾十年來的經濟融合伴隨著政治波動，兩岸關係的重點落在安全和經濟上面順理成章。除了一些東北亞地區環境合作的設想和初步構架之外，<sup>5</sup> 大陸和台灣沒有政府一級的環境合作動議。雖然從長期來看，有一些環境危害會影響到雙方(比如，全球氣候變化、海洋魚類種群數目下降、大陸酸雨對台灣的影響)，但是並沒有嚴峻的短期的環境惡化和資源短缺問題存在，從而促使他們開始環境方面的協商和採取共同的行動。簡而言之，目前並不存在迫使兩岸高層就環境事宜進行合作的危機感。<sup>6</sup>

如上所述，台灣海峽周邊地區並不會在短期內爆發生態資源方面的利益衝突，但是，由於相似的經濟發展模式，大陸、香港和台灣地區內部都面臨相似的新型的環境污染。在三個地區(在大陸，限於大型城市)進行的公共意識調查都表明，人們普遍認為生態惡化，尤其是空氣污染，是危害健康和生活質量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再比如，城市無限擴張，地面水資源污染，地上和地下水的非可持續性使用，同樣給自然生態增添負荷，威脅市民的健康。因為缺乏有害廢棄物處理場，加上當地社區常常無法瞭解政府生態保護的議程，兩岸都存在水土資源的退化污蝕。三地的政府都已經就上述的環境問題立法，然而也都面臨著大量執行和監督的困難。隨著民間環保團體(環保NGO)和有關媒體的力量發展，環境執法和監督中間的漏洞可能會被填補。加強民間環保的自我能力，將有助於他們更效的發揮輿論監督和大眾教育的作用。但是，我們從本次研討會和以前的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在兩岸三地，環保NGO自身還面臨大量的政治、體制和經濟方面的局限。

### 兩岸民間環保合作的前景

兩天會議期間的講演和發言展現了大陸、台灣和香港環境政治領域非政府部門的活力和發展趨勢。環保NGO都積極地參與政策制定，解決實際問題，並倡導大眾的環保意識；而環境記者也非常熱衷於報道環境破壞和環境運動的動態。正因如此，促進兩岸環保NGO、學者和媒體間在相類似的環境問題方面的信息分享及合作，能夠使人們和決策高層充分理解到整個大中華地區內生態相互依存、面臨相似的環境挑戰的狀況。長期培植非正式的環保網絡可能為正式的官方合作奠定基礎，而為解決相似環境問題建立的合作可能會增進兩岸間的信任從而可能擴展其它領域的合作。

雖然環境運動在大中華地區正蓬勃發展，通過這次會議我們的一個主要的發現卻是兩岸三地的環保NGO和新聞記者之間的溝通和合作還停留在較低的程度。<sup>7</sup> 政治層面的錯綜複雜可能是導致缺乏環保NGO網絡的直接原因。考慮到歷史和政治上的阻力，以及NGO自身的弱點，台灣、香港和大陸基層環保團體之間有限的交流和信息交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困惑我們的是這類民間的交流和對話的加強是否一定會對兩岸三地的彼此信任產生健康和長期的效益。<sup>8</sup> 僅僅一次研討會無法對上述的問題作出全面的回答，但是，本次論壇和此後與會者之間合作意向提醒我們去思索和推測跨社會的民間交往是如何幫助在公民與公民、政府與政府、地區與地區之間建立相互信任的(這也可以被視為是和平的前提)。我們認為兩岸民間環保團體間的交往可能起到以下的作用：

- 1) 加強整個地區內環保NGO和環境新聞的有效性。通過與其它區域環保同行的交流，環保人士可以相互學習運作中的經驗，提高自身組織的能力；通過交流信息和聽取有關新的報導主題的報告，三地的記者可以學到采寫更貼切和有說服力的文章的技巧。從台灣和香港的同行那裡，大陸的環保人士可以吸取網絡拓展、同私營部門合作以及向社會籌款的經驗。另一方面，大陸的環保NGO可以台灣和香港同行提供與國際NGO合作的得失教訓。牢固和可持續的NGO紐帶將有助於在大中華地區內培育一個“綠色的”市民社會。
- 2) 超越NGO部門和記者群範疇推廣解決環境問題的新思路。有些環保NGO和環境記者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他們所在社區的居民的環境意識，而另一些則直接參與到地方政府的環境決策和治理工作中。與其它地區同行間的交流使得環保人士可以將新鮮的知識和觀點帶回自己的社區，如此信息的擴散有利於建立新的理念，進一步促進對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的理解。
- 3) 為官方間的地區合作爭取國內支持。跨區域的民間環保組織網絡在倡導人們環境意識的覺醒的同時可能提請各級政府更多注意在環境領域合作的機會，來解決共同面對的相似的問題。
- 4) 促進地方政府和企業同環保NGO的聯合。在兩岸三地的高層環境合作尚未成型的階段，環保NGO網絡將會為地方政府、地方企業或者研究機構開闢新的合作領域。下面的一些例子展示了跨社會民間網絡已經發展了各種類型的有效的政府非政府環境合作關係<sup>9</sup>：

- a) 北京的南北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同國家科技部，以及美國NGO國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台灣經濟研究院、上海市經委、上海交通大學聯合進行燃料電池汽車的開

發和商業化研究(該項目已列入“十五”計劃重點項目)。

b) 貴州地球之友(發起人曾多次向我們介紹香港長春社對他們的成立有直接的影響, 并長期給予寶貴的支持)現在與貴州省政府和地方企業共同建設草海生態教育基地。

c) 美國NGO生態保育會(The Nature Conservancy)目前正與雲南省政府和40多家大學和當地環保民間組織合作實行一項大規模的雲南水資源保育計劃。

d)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定期在由他們進行管理的米圖濕地保護區對來自大陸的政府官員和學生進行培訓。

e) 美國NGO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和香港科技大學正在幫助大陸的多所大學將環境和可持續發展課題融入大陸商學院的課程中去。

f) 總部在美國、在北京設立中國分部的跨國NGO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IFAW)開展的亞洲象棲息地保育及社區發展項目將雲南思茅地區林業所野生動物科、雲南省林業廳、北京師範學院生態所、美國漁業和野生動物署聯合到一起,他們所推行的社區經濟發展模式減緩了由於亞洲象的活動對當地農戶造成的生存壓力。

5、加強大陸環保NGO之間的合作。與台灣和香港的NGO部門不同,大陸NGO之間的交往合作並不經常,很多大陸的NGO甚至不知道其它組織的存在。如本文集前面文章所提到的,台灣環保NGO之間的聯絡模式可以供大陸同行以借鑒。綠色NGO聚會,即使有很多外國的NGO參加,也會附帶對大陸NGO成長產生影響,提供機會讓他們彼此認識,加強聯係;NGO之間的交往也會進一步促進跨省市跨地區在環境方面的信息溝通。當前在大陸,跨省市或者省市行政區域內的環境和資源衝突事件屢見不鮮,並且勢頭有所上升,所以通過環保NGO間的交流,大陸的環保人士可能為解決這類的矛盾作出貢獻。

## 結論

香港研討會為與會者創造了一個機會來交流關於環保NGO和媒體在兩岸三地產生、運作和動員的不同形態,以及面臨的不同挑戰,具備的不同特長。加深彼此間的理解將為今後民間的交流和對話奠定扎實的基礎。4月份環保NGO和環境新聞論壇結束後僅僅幾個月內,我們已經高興地看到一些萌芽階段的合作動議:

- 1) 台灣野鳥學會在瞭解了雲南昭通黑頸鶴保護協會的狀況以後,馬上表示願意捐助望遠鏡以供在當地農戶中間開展教育和保護活動;
- 2) 綠色和平組織香港辦事處熱情接待了來自台灣的同行,介紹了他們如何運用信息技術動員開展了“反對基因改造食物”運動;
- 3) 今年夏天,台灣荒野協會發起人,生態攝影家徐仁修先生加入四川綠色江河探險隊伍,拍攝了金沙江的自然生態。這些照片將被用於由綠色江河主編的第一部全面介紹中國西南河流生態的畫冊。這兩家NGO的工作理念很接近,今後還準備一起合作更多項目;
- 4) 與會的記者們都沒有錯過採訪在場的NGO的機會,並在兩岸三地的多家媒體(報刊、雜誌和廣播)發表文章介紹三地民間環保運動的發展狀況;
- 5) 香港的NGO人士會後向我們透露,研討會幫助他們瞭解和確定了更多的大陸的NGO合作伙伴。

我們當初對香港研討會的構思是比較務實的,而研討會啟發了一些新的合作思路。我們希望這樣的一次會議和這樣的一體文集可以引起更多對環境合作可能促進民間環保組織的能力進而有利與地區和平進程的深層思攷和研究。

<sup>1</sup> 我們在此感謝威爾遜中心的同仁, Geoffrey D. Dabelko、孫亮和林岡,給予的寶貴意見。

<sup>2</sup> 環境與安全的學術界討論和有關文獻,參攷ECSP的網站<http://ecsp.si.edu>, 或者電郵 [ecspwwic@wwic.si.edu](mailto:ecspwwic@wwic.si.edu) 索取有關出版物, 電郵 [chinaenv@erols.com](mailto:chinaenv@erols.com) 或電話 1-202-691-4233索取“中國環境系列”年刊。

<sup>3</sup> 環境促和的有關理論參見 Ken Conca 的論文《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由P. Diehl等編入《Environmental Conflict (環境衝突)》一書, Westview Press 2001年出版。

<sup>4</sup> 在即將由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的《Environmental Peacemaking(環境促和)》一書中, Ken Conca 和Geoffrey D.

Dabelko 與其他作者收集比較了世界上六個不同區域環境促和的提議、發展、前景和存在的問題：里海、波羅的海、南非、南亞、中亞和美國-墨西哥邊境地區。讀者還可以參攷， Stacy D. VanDeveer和Geoffrey D. Dabelko 1999年編的《Protecting Regional Seas: Developing Capacity and Fostering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Europe (保護地區海域：能力建設和促進環境合作在歐洲)》，由威爾遜中心出版社出版，或可電郵 ecspwwic@wwic.si.edu 索取資料。

<sup>5</sup>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構架內有涉及環境和能源工作組，可能提供大陸和台灣政府代表會面和討論地區環境問題的機會。

<sup>6</sup>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和大陸之間確實面臨一些可能引起摩擦的環境問題。比如，(亞)熱帶季風將廣東省的空氣雜質帶到香港，或者相反方向。同時香港和廣東分享珠江的水源，而珠江水域現超負荷承載著這兩個地區的工業、農業和生活污水排放。

<sup>7</sup> 儘管香港環保NGO地球之友和長春社已經開始著力同大陸的伙伴發展長期的制度化的合作關係，大部分的與會者都彼此未曾謀面。實際上，許多台灣的NGO都不瞭解大陸有真正意義上的民間環保組織。

<sup>8</sup> 雖然兩岸的NGO建立網絡可能成為現實，但是政治高層對此是否會持保留意見、是否會對這個新興的“綠色”市民社會作出負面的反應還是一個問題。我們認為環保NGO網絡不會觸及政治上敏感的領域，因為在過去幾十年中，雙方的環境科學家和研究人員一直保持著常規的接觸。人道主義和文化團體間的往來同樣也沒有間斷過。甚至於雙方官辦的社會團體，在沒有政治參與的情況下開展了很多促進統一的活動。見Wang Xingxin Ken的文章《Taiwanese NGOs and the Prospect of National Reunific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台灣NGO與兩岸統一的前景)》，《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澳大利亞國際事務雜誌)》2000年54卷 第1期。

<sup>9</sup> 更多關於中國和美國NGO的信息參見《China Environment Series (中國環境系列)》或 <http://ecsp.si.edu>。